



菲尔丁

——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奠基人

萧 乾 著



菲 尔 丁

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奠基人

萧 乾 著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菲 尔 丁
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奠基人

萧 乾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南漕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3.75 字数 60,000

1984 年 8 月第 1 版 198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2,000 册

书号：10188·477 定价：(六) 0.37 元

目 次

一	时代背景	1
二	早年生活	8
三	戏剧写作	12
四	准备·酝酿·摸索	25
五	《约瑟夫·安德鲁斯的历史》	29
六	《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	37
七	《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	49
八	《阿米丽亚》	79
九	晚年的菲尔丁	94
十	局限与成就	100
附录(一) 简要年谱		111
附录(二) 参阅书目		113

一 时代背景

随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推进，英国小说从十七世纪末叶起，就开始逐渐摆脱中世纪代表君主专制和封建地主理想的骑士传奇的传统，朝着以普通人的现实生活为基础的新方向发展。这种根据广大人民的生活创作出来的小说，很快地就深入到社会的中下层，现实主义成为十八世纪英国小说的主流。亨利·菲尔丁(1707—1754)就是这个光辉传统的一位伟大的奠基人。

英国资产阶级在十七世纪所进行的革命，是在与封建势力妥协下宣告结束的。经过一六八八年所谓“光荣革命”的政变，君主立宪政体终于在英国巩固下来了，新兴的资产阶级与贵族、地主在“代议制”的基础上建立起联合政权。菲尔丁就出生于“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

这场革命确实为资本主义在英国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在历史上是向前跨进了一步；然而从这场革命中得到好处的却只是地主和资本家——当时的新权贵；广大英国人民的权利不但没有得到保障，生活状

况不但没有得到改善，他们还成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垫脚石。新的政权实行了比以前更加残酷的阶级专政，给人民带来了更加严重的灾难。

政治上，这个时期是极端腐败黑暗的。在长篇小说《阿米丽亚》(1751)中，菲尔丁通过书中人物之口，谴责当时的英国是“太阳底下最腐朽的一个国家”^①。在他的作品里，我们时常可看到关于贪污舞弊、卖官鬻爵的描写。由于痛恨腐败的政治，菲尔丁当然要抨击那个腐败政权的领导者——当时的英国首相、辉格党的党魁华尔普(1676—1745)。菲尔丁对华尔普及其暴政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在他的创作生涯中是极其光辉的一章。

代表商人、金融家和大企业主的辉格党(自由党的前身)，在上一世纪还就王权的范围和政体与代表土地贵族的托利党(保守党的前身)多少有过些分歧。“光荣革命”后，这两个轮流执政的政党之间就已经没有什么原则上的分歧了，他们的矛盾只不过在于集团的利益上，特别表现在议会席位和内阁职务的分配上。从一七一四年到一七六〇年，辉格党一直居于统治地位；其间，诺福克郡的大地主华尔普从一七二一年到一七四二年连续当了二十一年的内阁首相。

^① 《阿米丽亚》，第十一卷第二章。

这个辉格党的“不倒翁”是以贿赂起家的。在他当财务大臣的任期内(1715—1717),就曾假公济私地在王室巨额费用之外,每年又从国库额外支付巨款给国王乔治一世,以博取他的欢心。当政后,他公开用现金收买议员,用授予各种肥缺和称号的手段来豢养喽罗,培植私人势力。议会的席位是公开标价拍卖的,皇家勋爵也各有明码行市——一时,大商贾都摇身一变而为显赫的贵族。官场上蝇营狗苟,从上到下,贪污弄权。纽卡索公爵进入内阁时,就公开宣布要替他的“牲口找牧放的草地”——也即是替他的亲朋和同伙们安排些拿干薪的差事。

由地主、贵族和新兴的资产阶级所组成的上流社会,自然是糜烂不堪。特权阶级的男女整天价不是牌局就是化装舞会,沉溺在花天酒地之中。这些绅士和贵族妇女寡廉鲜耻,道德堕落,同时却又要假装体面;说的净是冠冕堂皇的话,干的却净是最卑鄙的勾当。宗教、伦理等等都不过是他们用来装扮自己、奴役穷人的工具而已。

菲尔丁生活于工业革命前夕,正当所谓资本原始积累的时期。反动统治阶级为了扩张势力,对内加紧剥削,对外穷兵黩武,肆意掠夺。英国商业冒险家凭借炮船的淫威,组成远征队或特许公司(例如臭名昭著的东印度公司),在世界各地干着种种肮脏的勾当,并且垄断着当时国际上利润最大、但也是最野

蛮、最惨无人道的生意——贩卖黑奴。一时间，利物浦港口和伦敦泰晤士河上舳舻千里，财富象水一般地从四面八方注入英伦三岛。对资产阶级说来，那确实是“贸易自由”的黄金时代。

在国内，资本原始积累首先从农民身上开刀。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后，立刻就进行野蛮的圈地运动。这种凭借血腥的立法对农民土地的强行掠夺，在十五、六世纪就已经开始了，但是直到十七世纪末叶，圈的主要还只是牧放牲畜的草地。那时，自耕农还占英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一。随着资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圈地的矛头逐渐转向农民的耕地。整个安女王（1665—1714）统治下，英国政府才只颁布过三道圈地法令，而从一七二〇到一七五〇年的三十年间，竟然颁布了七十六道圈地法令。难怪牛曼教授说：“照此做法，英国国王就是把人民驱入海中，也是合法的了。”^①到一七五〇年，自耕农这个阶层就被消灭掉了。在不到半个世纪里，一百五十万本来有自己的土地可耕的农民，一部分沦为佃农或雇农，一部分转入作坊或迁往海外殖民地，其余的就流入城市，成为无业游民。

战争进一步加剧了英国社会的贫富悬殊：军粮

①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一卷，第九二一页。

和军装的供应抬高了谷物和棉织品的价格，使地主和工场老板攫取暴利。为了打殖民战争，政府大量发行国债，这样，就更增加大资本家（债券持有者）对政府的操纵。为了付给他们巨额利息，反动统治者又加重赋税，从而加紧对英国人民的剥削。

十八世纪英国的苛捐杂税，说来真是骇人听闻。不但婚、丧、生育要纳税，甚至还有窗户税和火炉税。一七三七年，一个英国人写道：“我们通过窗户税对空气、日光和太阳的热交税，通过煤和蜡烛，对夜间的光和热交税。”^①这种横征暴敛自然引起人民群众极大的愤慨，抗税运动不断发生。

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特权阶层手里，广大的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这是十八世纪上半期英国经济面貌的基本轮廓。当时，英国人民贫困到难以想象的地步。菲尔丁晚年当法官时，有一次为了追缉逃犯，走进伦敦东端的一个贫民窟。在一份调查报告里，他谈起所看到的景象：一个面积不大的房间里住了五十八口人，臭得使他无法停留下来；另外一个房间里，竟然挤了七十名男女。当他为了执行职务而搜查他们时，从七十人的口袋里，统共只找到一个先令！

① 塔塔里诺娃：《英国史纲》，何清新译，三联书店一九六二年版，第二三九页。

在这种绝境中，一个人不是坐以待毙，就是铤而走险。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这些‘多余的人’当中谁要是有足够的勇气和愤怒来公开反抗这个社会，对资产阶级进行公开的战争以回答资产阶级对他们进行的隐蔽的战争，那他就去偷窃、抢劫、杀人。”^①

在菲尔丁为他的时代所描绘的图景里，犯罪现象占相当位置。《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几乎全部是以黑世界为背景；《约瑟夫·安德鲁斯的历史》（1742）和《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1749）这两部小说的主人公，出门也都遇上了强盗。在《阿米丽亚》开头的几章里，作者集中地描写了牢狱里的黑暗。

在十八世纪的英国，盗窃现象是很普遍的。住在伦敦市中心的作家荷拉斯·华尔普（1717—1797）在一封书简里写道：“即使在中午，出趟门也有如上战场一般。”一七五二年菲尔丁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区（英国国会及政府机关所在地）任法官时，他在《修道院花园杂志》里这样描写他的辖区：“这里，白天没有一条街不是充满了乞丐的，入晚就遍是盗匪。”在这个辖区里，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三个水兵去嫖一家妓馆，被妓女抢去了全部财物。水兵回船后，就纠集同伙，把那家妓馆整个捣毁，并把那一带其他的妓

①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一二八页。

馆全部烧光。这件事足以说明当时在伦敦卖淫也很普遍。

十八世纪的英国监狱里关的囚犯，人数之多在全欧洲首屈一指。当时，偷盗五个先令就被判处绞刑。每隔几天，犯人就分乘若干辆大车押往刑场，沿途看热闹的人山人海，象看斗鸡或赛马。那时，看这种死囚车也是时髦士女的一种消遣。

菲尔丁就生活在这样一个“野蛮的、胜利了的资本主义世界”^①中，然而，他同时也是生活在一个开始觉醒了欧洲。当时，西欧知识界正掀起一个启蒙运动。在英国，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的作者）和菲尔丁同是这个反贵族、反封建、反天主教运动的代表者。他们对“光荣革命”后的现实生活表示强烈的不满，痛恨英国政治和社会的腐败黑暗，对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群众寄以一定的同情。菲尔丁在作品里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真实地描绘了十八世纪英国各阶层人物之间的关系及各自的精神面貌。在理论方面，他还鲜明地提出“模仿自然”这个现实主义的主张。

① 福克斯：《小说与人民》，何家槐译，作家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五二页。

二 早年生活

菲尔丁出身于英国农村的一个破落贵族家庭，早年进的是贵族学堂，过的是富裕的生活。这段日子使他对英国上层社会有了深刻的认识。从青年时期起，家庭的贫困，迫使他定居伦敦，自谋生计，此后，贫穷就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受过出版商的剥削，坐过权贵的冷板凳，长时期躲过债，遭受过贫穷给人带来的种种灾难。因此，作为小说家，菲尔丁的生活基础是相当深厚的。他不但熟悉上层社会，对下层生活也有一定的理解；上层社会的一切，他是厌恶的；对广大的下层群众则寄以深切同情。

他的家庭是英国西南部萨默塞特郡的一个古老的世家，先代出过些名将显宦。到他父亲这一辈，家道虽已中落，但也还是个小有恒产的退職上校的家庭。但是菲尔丁的父亲艾德门是个嗜赌如命的浪荡汉。一七一六年，他在赌场上一次就输掉近八百英镑。菲尔丁是六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十一岁丧母，父亲又娶了个信天主教的意大利女人。菲尔丁和他的弟弟妹妹们都十分讨厌这个继母。为了反抗她，菲

菲尔丁挨过不少打。后来由于外祖母的干预，菲尔丁的父亲才把他送到伊顿公学去念书。

菲尔丁的父亲与他的外祖母为产权和子女监护权问题，打了好几年官司。从童年起，法院、律师就在菲尔丁的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尽管菲尔丁年纪还小，在那场诉讼中他却坚决站在外祖母一边，反对他那不务正业的父亲。一七二一年，当他父亲表示硬要把他从学堂拖回家去管教时，他就孑然一身，从伊顿徒步逃到他外祖母家去，表现出坚强的反抗精神。

在伊顿，他开始对古典文学发生兴趣，在希腊、罗马文学方面打下了基础。他特别爱读希腊喜剧家阿里斯托芬、讽刺家路喀阿诺斯和罗马诗人贺拉斯的作品。这些古典作家都给予菲尔丁一定的启发，在他的早期作品中也留下了印记。

一七二四年夏天，菲尔丁离开伊顿，在他外祖母家里自学。他的外祖父是位法官。菲尔丁在他的书房里读到许多有关法律的书，对法律开始发生兴趣。他还读了一些近代作品，其中包括塞万提斯的小说和斯威夫特的讽刺文。后来，菲尔丁在作品里还不时提到这两位作家对他所起的影响。

最早鼓励菲尔丁写作的是他的表姐玛丽·瓦特里·孟塔古(1689—1762)，当时的一位女作家。一七二八年二月，在她的帮助和支持下，菲尔丁在伦敦上

演了他的处女作：五幕喜剧《戴着各种假面具的爱情》。这个戏虽然大体上还因袭着王政复辟时期的喜剧传统形式，然而菲尔丁在这初露锋芒的习作里，就已经显示出反贵族、反封建的倾向。

这个戏描写一个纯洁的少女与当时上流社会风行的买卖婚姻进行的坚决斗争。女主人公海伦娜爱上了穷书生麦立托，她的叔父（监护人）特拉普却一定要她嫁给一个有钱有势的白痴贵族，她誓死不同意家人把她当作货物去拍卖。经过许多波折，她终获胜利。剧本正面歌颂了不肯同流合污的海伦娜。她认为：“我爱上的人，他的长处就是他的财富，而不是他的财富就是他的长处。”这是一个叛逆的女性。剧中还通过“形式贵族”的口，这样暴露上层社会对婚姻的可耻的看法：“我一向认为娶老婆就一定得娶个有家当的。只有不通世故的人才会侈谈什么品德才貌呢。品德是如此之罕见，我看不值得去追求；美貌又得来如此之容易，不值得弄到家里来。……美貌倘若再落到一个有品德的女人身上，那就象金子落到一个吝啬人手里，妨碍了它的流通。”

《戴着各种假面具的爱情》在伦敦朱瑞巷剧院一连演了二十八场，作为初次的尝试，应该说是颇为成功的。

演出一个月后，也就是一七二八年三月，菲尔丁到荷兰雷顿大学留学。雷顿当时在西欧是以进步闻

名的，有些启蒙运动思想家在那里讲学。那儿也是欧洲漫画家的一个活动中心，对菲尔丁在思想及艺术上的发展，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可惜他刚刚学习了一年多，家里就接济不上了。原来他父亲除了在赌场挥霍之外，还把一些积蓄交给一个经纪人去做股票投机生意，结果全部赔光。

菲尔丁回到伦敦，从此他就失了学，并且结束了优裕的生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面临了当个雇佣马车夫还是当个雇佣文人的选择”。

三 戏剧写作

戏剧是菲尔丁最早尝试的文学体裁，写戏是他的创作生涯的序幕，也是他的艺术及思想的萌芽。在从事戏剧创作的七年（1730—1737）间，菲尔丁不但显示出他在艺术上卓越的才能，也表现了他站在人民大众方面反对资产阶级暴政的鲜明立场，因而受到“戏剧审查法”的迫害。在那个重大考验面前，菲尔丁宁可放弃戏剧生活，也没有屈服。

十八世纪初叶，英国剧坛处于萎缩状态。伦敦舞台上大量上演着贵族作家所写的一些轻佻、淫秽的轻松喜剧。当时一些剧作家也很想整顿一下剧目，然而他们只拿得出一些劝善惩恶、宣扬宗教的说教剧，内容枯燥乏味，毫无风趣，所以不受群众欢迎。一时海报上贴的尽是一些《扯谎的情妇》、《时髦求婚术》一类剧目，剧里写的不外乎上流社会男女间围绕遗产与美色的勾心斗角。当时一出喜剧里的人物说：“结婚而没有遗产，那就好似驾船而没有压舱底儿的。”一位剧作家在一篇序言里写道：“一出戏要是没有纨绔儿、呆子、乌龟和荡妇，那就宛如星期天的晚

餐缺少了烤牛排和甜点心。”

一七二八年一月，窒息的伦敦剧坛刮来一股清新之风，这就是盖依(1685—1732)的《乞丐的歌剧》。在这个政治讽刺剧里，作者以大盗皮楚姆的行径，影射当时首相华尔普的暴政。它真实而巧妙地表现了英国人民对统治阶层的憎恨，采用的是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小歌剧形式，对话幽默俏皮，样式新颖别致，在伦敦舞台上获得空前的成功。

这个剧的上演给予菲尔丁很大启发。此后，在他所写的二十五个剧本中，最出色的也还是政治讽刺剧。菲尔丁在创作剧本时，曾广泛地吸取英国传统的民间戏剧(如露天傀儡戏)的手法。他善于把剧中诙谐或怪诞的成分与现实生活中的重大政治问题杂糅在一起，戏里还穿插着许多用通俗调子谱成的歌曲，有些到今天仍在流行着。

从一开始，菲尔丁就鲜明地宣布了他写戏的宗旨：向罪恶宣战。在他的初期作品《咖啡店政客》(1730)的“开场白”里，他深深怀念古希腊喜剧家对恶势力无情的诛伐——“罪恶一抬头，就把它打倒；最大的权势也庇护不了恶棍，喜剧的公正的讽刺照样把它严惩。”随后，他慨叹起这个伟大的方法久已无人使用，因为“罪恶已强大得没人敢碰……恶棍掌握了法律的剑，法律就保护它们。”但是青年剧作家菲尔丁拒绝向这种局面屈服。他断然宣布：